

生态文明建设与水资源循环利用的耦合

◎ 冯艳娜

随着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在带动城市经济快速增长之时,也使得城市公共资源供不应求,比如,水资源的需求量与供给量出现不平衡;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需要更多水资源来维持生活用水需求;随着工业生产规模化发展,钢铁、化工、纺织等高能耗工业企业的用水需求也显著上升。

然而,尽管城市不断提高自身的水资源供给能力,提高水资源供应量,但由于管道老化破损,人们在利用水资源时缺乏节约意识,出现水资源利用率不高,甚至伴有水资源严重浪费的现象,使得城市供水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因此,本文从生态文明建设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如何通过构建水生态文明体系来促进水资源循环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开展水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培养公众的水资源节约保护意识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要切实推动水资源循环利用,促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充分调动社会公众的水资源保护意识,使大家深刻认识到浪费及污染水资源的严重后果,形成水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的内在意识及行为习惯。

首先,抓住社区这一主要的宣传阵地,制作印发水资源宣传手册,设立专门的水资源保护宣传栏,详细介绍水生态文明的相关知识,如水资源分布、循环过程、水资源的生态功能,以及人类当下所面临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并定期组织水生态文明主题讲座、节水宣传周等活动,引导人们围绕水浪费、水污染的现状进行深入讨论,逐步提升公众的节能环保意识,主动参与到节水行动中来。其次,利用抖音、微博、快手等新兴社交平台,定期发布水资源危机的相关短视频、图文资讯等信息,发起“节水挑战赛”

活动,借助平台的激励机制,鼓励用户积极制作与节水相关的创意视频,营造全民参与水资源节约保护的良好氛围。最后,还应通过宣传,让公众充分了解先进节水设备和水资源利用技术的优势,引导公众主动接纳先进设备和技术。

完善水生态文明政策法规,为水资源循环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促进水资源循环回收利用,要想真正落到实处,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定统一的水资源保护利用法律法规,综合评定地区水资源总量,明确规定不同区域与用途的水资源分配方式,并加强水资源利用的监督工作,以有效保护水生态环境,构建起完善的水资源利用系统。

第一,地方应当依据国家出台的水资源保护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有区域特色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与法律体系,并成立专门的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合理分配水资源初次利用、二次利用以及监督保护的责任,明确各类水资源的责任主体,设置层次清晰、责任明晰的水资源管理程序。第二,各地需出台配套的水资源循环利用激励机制,对水生态保护中涌现出的先进企业和个人,予以经济奖励或提供政策扶持,激励带动更多人参与到水生态保护中;同时,严格落实水资源保护的执法制度,组织成立专门的执法队伍,开展水资源保护法规落实情况的监督工作,对破坏水资源循环利用以及污染环境的行为加以严厉惩处。第三,各地还应加强对水源地的监督保护,制定完善的保护制度与管理方式,开展定期巡查,发现破坏水源地的不良行为予以制止和处罚;安装先进的水资源监测系统,实时监控不同区域水资源的供给需求情况,水量水质变化情况,形成综合性的数据分析,发现最为严重的浪费水资源的环节,有针对性地采用调控措施和循环利用

技术,以减少水资源浪费,提高用水效率。

加强技术研发,提升水资源循环利用效率

面对日益紧张的水短缺情况以及水环境污染的现状,政府、企业以及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应加强合作,共同致力于新节水技术、新水网系统的研发,围绕水资源开采、流通以及回收利用的全流程进行深入研究,切实提高水资源的回收再利用水平。

其一,研发高效节水技术,推动低流量洁具、高效灌溉系统等节水器具和设备的应用。针对工业领域的高耗水产业,应进一步研发和推广工业废水深度处理技术,采用活性炭吸附水中的钙、镁、钠等金属离子,使其达到日常工业用水标准,将其用于车间的清洁、园区的浇灌等环节中,既提高水资源的重利用率,降低新鲜水资源的消耗,也可减少企业的用水压力。其二,优化水资源回收与处理技术。研发高性能膜材料,提高膜的分离效率和耐久性,降低成本,推动膜技术在海水淡化、苦咸水淡化、废水深度处理等领域的应用;加强高级氧化技术研发,有效去除水中的难降解有机物,提升水质,优化反应条件,提高处理效率,为水资源循环利用提供有力支持。

综上所述,切实提升水资源利用率,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举措,需要城市治理者充分重视水资源紧缺问题,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举措,引导社会公众、企业、组织等各类主体树立良好的绿色环保意识,从日常生活开始节约用水,并且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水资源利用与保护体系,打造文明环保的现代城市。

【作者单位:榆林学院。本文系陕西省榆林市科技局课题,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智能关键技术研究“大数据驱动的矿区水资源知识发现与智能决策技术研究”(编号:CXY-2022-93)的成果】

高校影视艺术教育:文化自信的重铸与提升

◎ 牛锦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高校纷纷响应号召,以立德树人为教育目标,坚持文化传承与创新并举,深入推进高校教育事业的和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影视艺术教育作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塑造学生文化自信的有效方式,更是助力国家影视艺术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渠道。

基于此,本文以高校影视艺术教育中文化自信的再塑造为切入点,深入探究文化自信融入高校影视艺术教育的路径,不断提升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期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影视艺术人才,为推动中华文化的创新性传承与创造性转化,以及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作贡献。

高校影视艺术教育具有综合性和广泛性,涉及中国传统建筑、传统戏曲、传统音乐等领域,在增强学生文化自信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高校影视艺术教育探索文化自信再塑造的路径和模式,可以引导师生成为文化自信的建设者、推动者和信仰者,切实厚植学生的家国情怀,提升学生的民族责任意识,同时进一步提升高校影视艺术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高校影视艺术教育中文化自信的融入,从侧面反映了影视艺术教育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趋势。现阶段,国家对影视艺术人才的要求逐步提高,社会对影视艺术作品的需求和诉求也在不断提升。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充分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影视艺术作品,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在丰富影视艺术创作灵感之时,也拓宽了影视艺术创作思路;影视艺术作品的创新表达与呈现,同样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与弘扬,为高校影视艺术教育提供了新的方向指引,使得高校在开展影视艺术教育的过程中,有计划有目的地融入文化自信教育,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启智润心、丰富影视艺术教育内涵和形式中的价值作用,引导学生坚定文化自信,助力高校影视艺术教育目标的实现。

完善影视艺术教育顶层设计,强化文化教育。高校应提高对影视艺术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完善影视艺术教育的顶层设计,在提升影视艺术教育成效的基础上,促使学生的文化自信获得显著提升。一方面,高校应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完善影视艺术教育的教材与课程内容,创新影视艺术教育的手段和方式,加强影视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稳步提升教育实效性。另一方面,高校应主动完善影视艺术教育的基础设施,加大设备以及技术的投入力度,为文化自信融入高校影视艺术教育提供保障。此外,高校应健全影视艺术教育课程体系,开设内容丰富、类别多样的人文性课程,如文学与艺术、历史与哲学、语言与交流等,促使学生全面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这些努力,学生能够从中汲取影视创作灵感,以影视创作为载体,融入文化元素,讲好中国故事,创作更多有温度、有力量、有筋骨的影视艺术作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弘扬。

丰富影视艺术教育内容,创新教育理念。高校影视艺术教育教师要善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用地域特色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中国审美,提取中国价值观念,利用地域文化中彰显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历史人文,增添影视艺术教育的文化内涵。具体来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文化融入影视艺术教育的教材编写与案例讲解中,教师在讲授影视作品题材选择、角色塑造、场景设计、音乐创作和情感表达的过程中,插入优秀经典案例,引导学生深刻分析其中蕴含的文化底蕴,并带

领学生感悟文化底蕴对影视艺术创作、发展的价值意义,不断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例如,对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中多线并进且视线逐渐收缩的艺术处理手法加以讲解,引导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战场上的激烈战斗状况,在这个过程中,着重突出讲解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的铁原阻击战,电影对这场战役的展现,将家国情怀、革命精神等展现得淋漓尽致。讲授这部电影作品,可以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促使学生对家与国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创新影视艺术育人模式,优化育人体系。创新高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育人模式,进一步强化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一是积极深化校企合作,构建校企协同育人的机制,鼓励企业参与高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育人方案制定、课程体系构建以及教学实践开展,为学生开辟与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相关的教育基地,鼓励学生在现代影视媒体策划、编导以及创作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二是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教师采用项目驱动教学法,引导学生以小组合作形式创作影视作品,促使学生自主展开调研、确定剧本主题、进行剧本创作和拍摄、完成后期制作,提升学生的参与感和体验感,促使学生在深入剖析中华文化内涵和价值的基础上,将其创新性转化为影视艺术语言,进而拓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形式和范围。三是开展实践教学活

动;联合其他高校,举办校园影视文化节,开展影视艺术文化交流 and 学术交流等,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

【作者单位:西安外事学院。基金项目:2023年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基于 ARCS 模型的《摄影技术与艺术》智慧课堂教学模式构建与应用研究”(编号:23BZ077)】

高职数字信息素养教育的发展现状与对策

◎ 朱小怡

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这意味着数字信息素养逐渐成为公民学习、工作、生活的必备素质。职业院校的信息化教学已成常态,现代职业教育也逐渐将学生的数字信息素养培育纳入教学范围当中。高职院校是我国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数字信息素养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学生未来的就业竞争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因此,我国针对现今高职院校数字信息素养教育发展状况,提出了诸多应对策略。

目前,我国虽已意识到学生数字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性,但这方面的实践仍存在不足,导致学生对数字信息技术与技能的学习普遍缺乏动力,从而难以真正提升学生的数字信息素养水平。针对上述问题,应采取多种措施,提高高职院校对数字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视程度,确保将这一教育纳入现代职业教育核心课程,为真正落实高职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第一,完善政策支持,为数字信息素养教育提供良好政策环境。要提升高职院校的数字信息素养教育质量,教育行政部门应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支持作用,通过出台相关政策,为高职院校数字信息素养教育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首先,相关部门应明确规定高职院校必须将数字信息素养教育纳入其核心课程体系之中,并针对该教育课程制定统一的课程标准,包括具体的课程内容、教学目标 and 任务、教学方法和评价标准等,各校可根据社会人才需求变化进行细化,确保其课程标准适用于本校。其次,政府部门应为高职院校数字信息素养教育的开展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如设立专项基金或项目资助基金、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也可鼓励更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高职院校数字信息素养教育工

作,减轻学校的经济负担。对于教育效果优秀的高职院校,政府还应通过增加拨款、项目优

先推荐等表彰、奖励方式,激励高职院校更积极地开展数字信息素养教育。

第二,优化课程设计,为数字信息素养教育践行提供突破口。课程设计是提升学生数字信息素养的关键环节,设置科学合理课程体系,能够帮助高职学生系统掌握数字信息素养知识与技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

力。在具体实施中,高职院校可通过目标分解来构建多层次、模块化的课程体系,即根据不同专业特点和学生需求,设计模块化的数字信息素养教育课程。这些课程可分为基础模块、专业模块和拓展模块,涵盖数字信息的基本理论知识、常用工具及各种新技术,内容设置既具多样性,也具实用性。学校还需要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合适的课程模块组合,从而实现个性化教学。同时,高职院校也应强化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增加实验实训课程、组织举办编程竞赛活动、与企业合作开展项目等,让学生有足够的实践操作机会,从而提高学生解决数字信息素养实际问题和应用数字技术工具的实际操作能力。

第三,丰富教学资源,为开展数字信息素养教育提供充足动力。在高职院校数字信息素养教育中,丰富的教学资源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一方面,高职院校可从教师队伍建设与完善着手,通过定期组织教师参与数字信息素养教育培训,或从外部引进更高水平

的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实现教师队伍结构的优化,提升整体教学水平,为高职院校更好地发挥数字信息素养教育效益提供可靠保障。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可通过增加投资,来完善与数字信息素养教育相关的设备、软件,这是开展数字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基础,也可为学生进行数字信息技能实践操作提供重要支持。另外,高职院校还应用网络,开发、整合更多的内容丰富而全面的在线教

学资源,以此作为学生数字信息资源课堂教学的额外补充与延伸,既可为学生数字信息素养和实践技能提升提供便利,也有助于学生实现个性化、高效率学习,推动高职院校数字信息素养教育

教学改革的更快实现。

第四,完善评价体系,为推行数字信息素养教育提供可靠反馈。良好的教学评价与反馈机制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与效果,在数字信息素养教育中,高职院校也应重视对教师、学生综合能力的评估,通过构建科学、全面的多元化评价体系,来对教师的教学质量与效果进行评估,并对学生的理论知识掌握程度与实践创新能力进行考核。如基于学生的学业成绩、课堂参与度及教师的教学反馈、科研成果等评价指标进行考核,并构建有效的反馈机制,既能帮助、引导教师改进其教学方法、手段和内容,也能鼓励、帮助学生探索更科学的学习方式与路径,最终提高高职院校数字信息素养教育的水平。同时,该评价体系与反馈机制的实施,也有利于高职院校更快实现数字化教学改革,学校管理层可在充分了解数字信息素养教育情况后,根据发展规划与要求重新调整其数字信息素养教育的课程设置与资源配置,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数字信息素养与实践应用能力。

总之,通过完善政策措施、优化课程设置、丰富教学资源条件、完善评价体系等,高职院校数字信息素养教育质量和水平可实现有效提升,为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数字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助力。相信通过发展高职院校的数字信息素养教育,我国公民的数字信息素养水平将得以提高,“数字中国”建设目标将会更快实现。

【作者系杭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本文系2023年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杭州高质量发展数字化会展的路径与对策研究》(课题编号:M23YD022)的研究成果】

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大多数官僚由士族世袭,以及由地方推荐,从而产生门阀垄断现象。而科举制度则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制度性桥梁,使普通学子得以跨越身份障碍,步入官僚阶层,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然而,随着王朝危机的加深以及新学的不断传入,传统儒学因无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而逐渐衰落。随后科举制的废除,使士大夫身份阶层被新的职业群体取代,构成了全新的社会阶级。

一、科举制度的历史回眸

科举考试作为选拔高等文官的重要途径,从以行政区划最末端的县为单位的县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往往有近十万考生参与其中,历经乡试、会试等层层筛选,最终脱颖而出的考生,进而步入官僚体系。

作为一种人才选拔机制,科举考试着重考察考生的两项核心能力:文章写作与经书解

读。至明清时期,八股文成为科举作文的标准化格式,要求考生深入研究经义文理,方能创作出既符合八股规范又蕴含经义深意的佳作。这一过程促使学子深刻领悟经典思想,将经学思维内化于心,从而成长为秉持儒家价值观念的士人。科举教育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封建统治的稳固与持久。其缘由在于,封建统治的核心是以儒家伦理政治意识为基石,由有德者对民众实施教化。然而,在这一体系中,似乎官僚只要拥有文化能力和道德品质,就可以去指导民众、治理国家,而治理所需的行政专业知识,则未被纳入科举考试范畴。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19世纪后半期,承担政治近代化改革重任的,仍是那些接受传统经学教育的官僚士大夫,这使得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二、西学涌入与传统儒学的危机

中国近代化改革的启幕标志为“洋务运动”。两次鸦片战争的挫败,迫使士大夫承认西方国家在军事实力与科学技术上的领先,进而萌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意愿。然而,这种学习并未触及中国传统教育机制的根本,多数士大夫认为,中国的落后仅在于技艺层面,而非思想体系或社会政治制度。因此,尽管国家面临危机,但经学价值信念依然稳固,教育体系中仍以经学为主导,仅在此基础上增设了洋务学堂,以培养制造、外交、军工等领域的实用人才。在士大夫主导的知识界看来,京师同文馆、电报学堂等洋务学堂,不过是应急的职业技术培训机构,一旦需求减弱,便面临被裁撤的命运。洋务学堂的学生多来自贫寒家庭或科举落榜者,真正的科举精英并不愿涉足洋务知识。这些学生难以融入士大夫阶层,多充任士大夫的幕僚、秘书等职位,处于知识分子的底层,未获社会充分重视。因此,洋务运动期间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数量有限,但亦涌现出冯桂芬、李善兰、王韬、郑观应等“条约口岸知识分子”。

鸦片战争后,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的开放,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舞台,也为新思想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这些口岸城市远离传统政治文化中心,成为中外思想交汇的前沿。“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受过良好传统教育,因家境贫寒或科举不顺而转向开放城市,从事西书翻译、新闻工作等职业。他们与传教士、商人频繁交流,亲身体验到西方机械技术与自然科学的优越性,明确提出教育改革的办法应“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算数、历法、河工等“富强之术”,即在保持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基础上,引入西方实用技术。这一观点影响了上层官僚的决策,如李鸿章在上海、广东开办的新式综合性学堂,便参考了冯桂芬的章程规划。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观,实则透露出他们对传统道德伦理及制度的深切忧虑。他们认识到,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传统经学已无法全面应对晚清中国面临的挑战,必须博采众长,方能走向未来。尽管作为少数派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对晚清社会的影响有限,但他们将西学融入儒学的观念,纠正了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偏重道德思辨而忽视经世致用的倾向,为20世纪知识分子由恪守经典向崇尚新学的转变,奠定了部分思想基础。

三、科举废止与新型知识分子的崛起

引发知识分子界深刻变革的标志性事件,无疑是科举制度的废止。步入20世纪,清政府着手实施名为“新政”的一系列政治革新,至1905年,历经千余载的科举制度,在日益高涨的批判声中宣告终结。科举作为维系士大夫阶层存续与再“生产”的核心机制,以及学者与官僚身份等同的桥梁,其废除不仅颠覆了中国统治阶级千百年来赖以稳固的根本架构,更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构成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

在此背景下,往昔“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并规划自身的前程,留学教育因此成为关注的焦点。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已出于技术学习的目的,向欧美派遣军人与幼童,专攻海军技术、铁路制造及船政等实用领域。随着留学热潮的兴起,学子们的志向不再局限于机械技术的研究,而是扩展至政治、法律等人文科学领域。留学群体的构成亦发生转变,由原先的官派留学生为主,转变为更多基于个人求学意愿的民间自费留学生。

对于学成归来的留学生,清政府采取了考试录用的方式,吸纳他们进入官僚体系,服务于统治阶级。然而,随着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学子的职业路径日益多元,人仕已不再是唯一选择。留学归国者怀揣多样理想,或投身军旅,或兴办实业,或从事教育,或参与革命,共同推动了社会多方面的改革同步且迅速地展开,打破了科举取士所形成的高度一元化社会权威结构。

然而,清政府的“新政”未能扭转其危局,面对内忧外患,士大夫阶层逐渐丧失了思想界的领导权,那些接受了西方教育、拥有新职业选择与政治观念的知识群体,则从改良阵营中分化出来,重新审视国家命运。他们以西方近代思想为武器,矛头直指清政府,通过革命手段推翻专制统治,成为推动民主共和制国家建立的重要力量。

四、结语

综上所述,清朝末年中国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学堂的崛起,孕育出一个掌握科学知识、秉持近代思想观念的新兴知识阶层。这一阶层不仅成为引领时代思潮的先锋,更是推动国家迈向民主共和的重要力量。相比之下,官僚阶级中的士大夫,因固守与时代脱节的义理取向,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彻底丧失了其赖以生存的制度根基,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深入剖析晚清知识分子群体的演变,不仅可以从思想层面洞悉封建体制瓦解的缘由,还能揭示社会政治领导力量的深刻变化。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科举兴衰与近代知识分子转型

◎ 李昕晖